

# 一 经济思想

宋子文有没有经济思想？进而言之，宋子文对于发展社会经济、对于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，是否提出过较系统的观点和主张呢？

作为国民政府时期最著名的理财家、地位最高的金融家，宋子文最为注重、谈论较多的无疑是财政和金融问题。即使他以行政院副院长、院长的身份所发表的言论中，也较多涉及到当时中国的财政与金融。近几年来学术界在研究宋子文时，较为关注的也是宋氏对于财政金融的论述。

然而，应当指出，从本世纪 20 年代至 40 年代后期，宋子文对于社会生产领域、流通领域及相关问题，提出过不少的观点和主张。宋子文对经济问题的关注，与他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过与发展社会经济直接相关的职位，有着密切的联系。例如，在 20 年代担任广东省商务厅长期间，他的职责范围便涉及到主要商品的生产与供给，包括农、林、渔、副、矿、工、运输、仓储等诸多行业。又如，在 30 年代主持全国经济委员会期间，直接职掌关于国家经济建设或发展计划的设计及审定、各项计划应需经费的核定、计划的监督指导、特定经济建设或发展计划的直接实施等事项。<sup>①</sup>

<sup>①</sup> 参见《修正全国经济委员会组织条例》（1933 年 9 月 23 日），《国民政府公报》第 1244 号，第 1 页

全国经济委员会设有农业、水利、工程、公路、卫生实验等处和丝业改良、棉业统制等专门委员会。再如，抗日战争结束后设立并由宋子文任委员长的最高经济委员会，其职权范围涉及到经济资源利用、经济政策决定、经济计划制定、经济工作考核等重要方面。<sup>①</sup>他在这类机构的任职，使他有可能较多地了解社会经济状况，并且必须直接处理相关问题。

还应当看到，无论政府财政还是金融，都离不开社会经济。例如，各项国税收入，无一不直接或间接关系到经济领域、经济活动；金融运作与经济发展之间也存在着互相制约的关系。无论作为财政部长还是中央银行总裁、中国银行董事长，宋子文都必须对相关的社会经济问题进行思考。

而当宋子文以行政院代理院长、院长的身份活跃于政坛的时候，他所关注的除了经济问题外，还大量地涉及到经济与政治、军事、外交之间的诸多关系。

宋子文曾对社会经济的许多问题发表过言论，但从遗留的资料来看，他只对某几方面的问题提出过较系统的观点和主张。了解、分析这些观点和主张，也就是研究宋子文经济思想的主体部分；同时，对于研究和评价国民政府的相关经济政策，具有重要的意义。

## 重视发展社会经济的观点

从 20 年代中期至 40 年代后期，宋子文曾多次发表过应重视发展社会经济的言论。

<sup>①</sup>《最高经济委员会组织条例》（1945 年 11 月 26 日由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）见《大公报》，1945 年 11 月 27 日。

在广东国民政府时期，宋子文这方面的思想主张集中体现在广东商务厅的《商务行政计划书》中。这份计划书系由宋子文以广东商务厅厅长的名义发表，最初刊于 1925 年 7 月 29、30、31 日的广州《民国日报》；稍作文字修订后，又于同年 8 月 12 日正式呈报广州国民政府。当时，广东地区已全面爆发省港大罢工，对英国实行经济绝交；英国则凭藉其在华种种特权及势力，对广东革命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。因此，在国民政府所辖地区里，社会生产、流通和消费等方面，都遇到了严重的困难。《商务行政报告书》实际上是任职才一个月的宋子文，对于解决广东社会经济困难所提出的各项建议和设想。

宋子文认为，中国商务疲困、实业衰弱，国民政府在广东省政府内设商务厅，就是为了提倡维护、挽回补救；而英国对广东方面进行经济封锁后，导致“市面金融首受影响”，加上“必需品向未储备，民间食用尤起恐慌”。<sup>①</sup>因此，当时广东地区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，便是确保有关国计民生最基本用品的供给。宋子文相应提出了下列各点。

一、在粮食供应方面，奖励和保护米商从外省运粮入粤，解决不敷供应、米价腾贵的困境，同时采取措施，增加广东农业产量。他提出应“奖劝各商源源输入，政府担任保护”，这样，米价也得以平抑；另对于侨商公司专运米面来粤接济，也允立案保护。宋子文指出：“盖米价既平，而政府又保护其输入，奖劝其来源，则本省民食自不致有匮乏之虑。”<sup>②</sup>宋子文也认识到，作为国民革命的根据地，广东产粮“供不敷求，全恃外来接济”，这种状况应设法改变。为此，他提出了增加广东农业产量的若干措施，建议

<sup>①</sup>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：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》，第 4 辑（下），第 1154～1155 页，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6 年 9 月版。

<sup>②</sup> 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》，第 4 辑（下），第 1155 页。

研究其可行性：仿行湖南，试行禾稻每年三熟制；利用瓦斯促进农产；改良种子；肥料合宜；防阻病虫害；农事试验场。总之，“务使本省尽其地力，农产加增，即一时不能免于仰给他方，亦冀其渐有可恃之进步。”<sup>①</sup>

二、解决以煤为主的燃料问题。宋子文认为：“煤为交通上、实业上所必需之物”，应保证供给；其来源可为：“（甲）开辟来路（乙）节制用途（丙）特许输入。”为此，拟采取订租专备运煤船舶、到国内各矿购运等应急措施。但是，宋子文还看到：“欲求经济之独立，惟有自行开采，以图根本解决。”当时广东北江有私营煤矿，为促使其增产，宋认为除了应“责令该公司增加资本，修整机器大举开采”外，政府有关部门拟对该矿实行奖劝和保护措施，如减免税捐、核减运价、长期订约购用、选派军警保护。这样，“成本既轻，销路又广，而公司资产亦有保障，庶投资者可以踊跃矣”。<sup>②</sup>

三、促进土丝输出。宋子文指出：土丝为广东输出大宗，每年进款达数千万元，对社会经济关系颇大。他提议采取以下措施：1. 设立出口土丝检查所，聘请外国缫丝专门技师从中检验，以增加国际贸易信用及推动直接输出；2. 设立蚕桑馆，改良蚕种及收贮桑叶方法；3. 令原有之丝业研究所研究对外直接推销手段。<sup>③</sup>

四、发展运输，包括江道运输、海道运输、铁路运输。他特别强调，必须扭转以往华商货运依赖和受制于洋商货栈的状况，建议华商各业先以集股方式设立公共货仓。宋子文指出：“仓库一项，为输出人之补助机关，亦为金融界之附属营业。各商除自设货仓外，均恃沙面洋栈为存储货物之所，非但利权外溢，且于商业为

① 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》，第4辑（下），第1159页。

② 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》，第4辑（下），第1155~1156页。

③ 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》，第4辑（下），第1156页。

洋商所把持操纵，初非计之得者。”故此，宋子文提议发起公共货仓，依照有限公司组织，由商界集股开办，推举有经验者数人共同管理。<sup>①</sup>

五、保护、促进本国工艺出品。宋认为可采取下列措施：1. 设立商品陈列所；2. 定期评审优劣，研究改良；3. 提倡专利；4. 奖励发明；5. 登记商标，以保其权利，促其精进”。<sup>②</sup>

此外，宋子文在《商务行政报告书》中，还提到了消费合作、保险、货币、汇兑、修正公司条例及其他商务行政规章、制订履行划一之权度并定期检查、普及商业注册、取缔经纪交易等方面的措施，认为这些措施对促进广东工商实业具有重要作用。

1925年9月下旬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后，一度仍兼任商务厅长。此后他在公开的场合虽然较多谈论财政问题，但仍不时地强调发展经济建设的重要性。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，宋子文提出：“现在本省之军事已告结束，建设事业实宜起始。”他谈到，国民政府将“从事于国家之伟大经济之建设”，如建筑黄埔商港，“此计划完成之后，广东能由香港手中取回对外商业之权衡；如广东能由香港手中取回其商业赢余之半数，则以商港每年之入款，当有一万万五千万，建筑商港计划之关于国家及民生之福利，实至巨且大。”<sup>③</sup>当年5月，宋子文又在《发行国民政府财政部有奖公债告民众书》中，进一步指出：“现国民政府系与人民合作之政府，鉴于民生疲敝，实业不振，非急规定以兴办各种实业，则不足以资御帝国主义者之侵略，挽国家于危亡。”他还把兴办各种实业，称作为“谋国民之利益”和“开

① 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》第4辑（下），第1157页。

② 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》第4辑（下），第1159页。

③ 《广州民国日报》，1926年1月11日。

国家永久之财源”。<sup>①</sup>

当然，由于广东时期军事行动频仍，应付军事需要成为国民政府施政的头等大事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宋子文谈论发展经济的重要性，也不可避免地强调经济建设要服务于军事、带有相当的“战时经济”色彩。另外，宋子文在论述发展工商实业的时候，涉及的大多为广东一地的问题，学理性也较差，因而其结论的普遍性意义也就较小。当时国民政府实质上还只是地方性政权，所要解决的最迫切的问题是军事和政治，在经济领域中难免持急功近利的立场。这也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宋子文思考经济问题时的视界。

1928年1月起，宋子文担任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。在更为频繁和紧迫的筹款压力下，他对发展经济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也有了深化。同年6月，他发起并主持了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经济会议，这充分体现了宋子文对经济建设的重视。他在向国民党中央当局报告召集全国经济会议的缘起时，作了以下的说明：“财政为国家命脉，而整理财政，尤应注重国民之经济。现在北伐完成，财政得告统一，凡百建设，必须通盘筹划，积极措施。”<sup>②</sup>在全国经济会议期间，宋子文一方面肯定了北伐军事的合理性，称在北洋军阀统治下“无论国家经济、社会经济，皆处于枯窘之地。国民政府之所以奋起义师，无非为人民谋幸福，将出诸水火而登诸衽席。”另一方面，他又着重强调了北伐完成之后，必须迅速开展全面的经济建设，指出：“（北伐）用兵之际，不能无所破坏；破坏之后，亟宜尽力建设耳。非破坏无以涤旧腐，非建设无以畅新机。所谓建设者，苟非于经济上先立基础，则徒托空言，无裨

《广州民国日报》，1926年5月15日

<sup>②</sup> 宋子文：《财政报 1928年6月份工作报告》引自《财政公报》第18期，第82页，1929年2月1日。

事实。<sup>①</sup>他的结论是：“北伐成功以后，国民革命工作完成逾半，建设工作应即自此而起。”<sup>②</sup>宋子文在经济会议上的某些提案，也体现出了“军事结束，建设开始”的观点，例如，他提出应改良内外债信用，“以资筹款为建设之用”；提到了应该尽快恢复商业及相连各种问题；认为应把“无用之款移用于生产企业，并实行中山建设计划”<sup>③</sup>

同年7月上旬，在全国财政会议上，宋子文在代表财政部所提出的施政大纲中提出了与“财政政策”并重的“经济政策”。该经济政策部分包含了以下与发展社会经济建设直接相关的内容：

一、扩充陆海空交通，包括整理铁路、推广航业、改良邮电。

二、实行兵工建设，军事底定后着手裁兵，即以被裁之兵，从事水利、道路、屯垦等建设事业。

三、保护贸易，包括：1. 实行保护贸易制度，订定奖励出产品办法；2. 颁定贸易合作办法，统一对外贸易。3. 在通商口岸设局管理。

四、发展生产。包括7个方面：1. 铁矿国有；2. 对煤、油矿、及各特种矿，根据情况分别实行国有、社会公有和商办；3. 奖励制造矿业机械，及设立各种金属冶矿机厂；4. 实行提倡渔业政策，以发展全国水产之利；5. 实行提倡森林政策，以发展全国材木之用；6. 督促全国，厉行畜牧事业；7. 振兴全国农田水利。

<sup>①</sup> 《国闻周报》第5卷，第24期，1928年6月24日。

宋子文：《在全国经济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词》（1928年6月20日），《申报》，1928年6月21日。

<sup>②</sup> 宋子文：《财政部施政大纲电》（1928年7月11日），《国闻周报》第5卷，第28期，1928年7月22日。

宋子文的上述主张，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中国资产阶级为发展经济、振兴民族工商业而对安定的社会环境的迫切期望，从而引起了工商界头面人物的共鸣。例如，在全国经济会议上，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，一方面指出了战争给中国社会经济造成的灾难：“全国之人力财力物力，皆消耗于不生产之途；全国资产之减损，固不可以数计；而已有之产业，亦几无以图存；农产则因交通阻滞，货弃于地；人民则因遍地战区，流离失所。加以币制紊乱，物价腾贵，一言蔽之，全国之经济组织，几于完全崩溃。”另一方面。他呼吁国民政府缩减军费，确立完全之财政金融制度，“庶几国家得以实力辅助生产事业之发达，此为经济复兴之根本原则”。张的这些观点，可谓与宋子文的主张如出一辙。张嘉璈并把宋的讲演誉为“伟论”，表示把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前景寄托在宋的“力为提倡”上。以全国经济会议名义发出的裁兵通电，则指出：“革命成功，建设开始。以言建设，则首当注重经济；以言经济，则首当注重裁兵。”通电还进一步建议把裁减的兵员用于屯垦、道路、水利等经济建设事业上<sup>②</sup>。尽管后来国民党各派之间战火迭起，中国资产阶级的“弭兵建设”的愿望始终难以实现，宋子文却一直被视作为力倡经济建设的代表人物。

事实上，宋子文以后又多次强调过经济建设的重要性。1930年7月，即当蒋冯阎中原大战尚未决出胜负之际，宋子文便同行政院院长谭延闿联名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出：“经济建设为本党最要施政方针之一，而一切建设方案，非集思广益，不易拟定；即一切临时办法，亦宜讨论。”据此，他们建议再次召集全国经济会议以制定发展经济建设的方案，并且还拟具了召集全国经济会

《申报》，1928年6月21日

② 《国闻周报》第5卷，第27期 1928年7月15日。

议办法纲要 8 条。<sup>①</sup>这一建议当然不可能付诸实施，但却反映了宋子文对内战频仍妨碍经济建设的不满。中原大战结束后，宋子文又向国民党当局提出，“国家生产力已不受若何束缚”，大力发展经济建设已有可能，应列入议事日程；他进而指出，除了财政和金融问题外，“实业当如何振兴，丝茶等业当如何恢复旧观，交通线路当如何开辟，普及教育及公众卫生当如何提倡，此尤为民众仰望于政府”，对这些问题，政府不应当回避塞责。<sup>②</sup>宋子文在这里谈到的“民众”，主要是指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，宋俨然以他们的代言人的身份出现，尽管他的这番话并未能产生多大的实效。在 1932 年 12 月的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上，宋子文与伍朝枢、孙科等人联名提出了关于发展工业的提案，认为中国“工业不振，经济落后日甚一日”，其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，即工业原料大都依赖进口、运输条件和组织严重落后、国际国内市场均趋衰落。宋等人呼吁采取有力措施，奖励生产，改良运输，开拓市场；并建议召集全国工业生产会议，“在政府指导之下”，“解决一切关于工业上的困难问题”。<sup>③</sup>1933 年出访欧美回国后，宋子文又公开谈道：“子文外感于世界经济文化国防，凡百设施之突飞猛进，内忧于近年我国天灾人祸之纷至沓来，认为立国之道，惟在以国民经济为中心，而以国家全力维护与发展之。”<sup>④</sup>

宋子文往往在重大战乱结束后，便立即强调发展经济建设的重要性。前面提到的几处论述，便分别是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、“二次北伐”、中原大战、第一次淞沪抗战、中日长城之战等大规模

① 引自国民政府第 426 号训令（1930 年 7 月 26 日）。《国民政府公报》，第 531 号，1930 年 7 月 28 日。

② 《财政公报》第 44 期，第 85 页，1931 年 4 月 1 日。

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》，第 5 辑，第 1 编政经济（5），第 157～159 页，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 年 6 月版。

④ 《国闻周报》，第 10 卷，第 35 期，1933 年 9 月 4 日。

模军事行动之后，向国民党中央当局提出，并且公之于众的。在他看来，战争期间一切服从于军事需要，而且也无法进行正常的经济建设。但在军事行动结束后，一方面迫切需要迅速弥补社会物质资料的巨大消耗和损失；另一方面，和平的社会环境，也为发展经济建设提供了可能性。到了抗日战争结束之时，宋子文又强调了发展经济的重要性。

在抗日战争的绝大部分时期，宋子文甚少谈及中国的经济建设。但在战争结束前夕，宋子文已经考虑到战后中国的经济振兴，认为届时中国将实施多个大规模建设项目，包括长江三峡工程。<sup>①</sup> 1945年7月20日，宋子文以行政院院长的身份向国民参政会作报告。当时日本尚未宣布投降，但中国抗战即将获得最后胜利，则是确定无疑了。宋子文在报告中指出：“三民主义民生最为重要，如果经济上没有办法，一切都不能建设起来。”他明确表示：“现在最困难的问题，还是经济问题”；并且预见说：抗战胜利之日，便是“国家大规模建设的时候”。<sup>②</sup>显然，在宋子文看来，抗战胜利之后发展社会经济又将成为中国的主要问题，必须予以高度重视。

1945年11月26日，抗日战争胜利约3个月。宋子文以行政院院长兼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，又一次提出了经济建设问题。

宋子文首先强调了战后进行经济建设的艰巨性。他说：“现在我们面临着无数困难，使任何经济建设政策遭遇极大的阻力。我们必须抱着大无畏的精神，去克服这种困难，使经济建设的政策能够彻底实现。”与以往不同的是，宋子文不但指出了迅速发展社会经济建设的必要性，而且提出了发展经济建设的几个前提：1.“政府负责的人要努力苦干”；2.“环境要从速改善”；3.“所采取

<sup>②</sup> 《大公报》，1945年7月21日。

的经济方案要适合我国国情，同时也不违反经济的原理”。<sup>①</sup> 与20~30年代时的有关论述相比，宋子文抗战胜利后指出的这几项前提，显然是从较高的角度提出来的。这与宋子文当时在国民政府中所处的地位有关——他不再是财政部部长，而是全面负责的行政院长。

与这一地位变化相应的，宋子文还提到了发展经济建设的一些既具体又颇为重大的问题。

一、发展经济建设，需要“最新最高深的科学知识”及“第一流的技术人才”。

二、安定金融，是对经济最基本的扶助；否则，“一切生产事业即不敢放胆前进”。

三、注重交通运输。“现在农工商业复兴之重大障碍，当是长期抗战后运输工具的大量破坏，及各地方交通的梗阻”。他进而提出，政府必须“积极恢复主要铁路线、长江及沿海航线、内地重要公路，以及进一步完成各大都市间的空运”。

四、注重发展能源工业。“现代生产机械化所必不可缺之条件，即必须有价廉的动力”，因而政府“应先注重煤的生产，及各地产煤的分配情形”。他并且明确提出了长江三峡的水电工程项目，认为在“工业发展到相当时候”，“政府应不惜巨大资本，开发大规模水力发电事业，并先要作种种技术上的准备”。<sup>②</sup>

可见，这个时候的宋子文，已不再是仅仅强调经济建设的必要性了。他强调了科学技术和技术人员在发展经济建设中的关键作用，这当然是很有见地的。他还从社会经济运动各主要环节的相互制约原理着眼，指出了能源、动力、交通、金融对恢复发展生产的重要性。

<sup>②</sup> 《大公报》，1945年11月27日。

另外，战后初期宋子文较多地从改善社会日常消费状况出发，来谈论发展经济建设的重要性，以及政府在这方面的职能和所负的责任。

1946年1月，宋子文在谈到设立中纺公司的意义时，指出：“政府对于人民的衣食住行，所谓民生的四大需要，必须负责确实改善，提高并供给其生活所必需。”他以“衣”为例，指出：“纱布系属生活必需品，政府必须对于纺织业之发展，力促其成。”<sup>①</sup>

1946年3月22日，他在国民参政会上作报告。该报告虽被称为“政治报告”，但基本上都在谈经济问题，而且主要是对“衣食住行”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。他宣称，政府“必须尽力在先行应付人民‘衣’‘食’‘住’‘行’的需要求最低限度的供给”。不过，对这四个方面的需要，宋子文提出的解决办法有所不同：“衣”的方面“尽量设法使纺织工厂复业”；“食”的方面，“尽力疏通运输，奖励商运，以期由多产之省运往歉收地”；“住”与“行”则寄望于来自国外的援助。<sup>②</sup>

但是，从1946年春起，宋子文已较多地提到发展社会经济建设所遇到的重大困难。这时，距抗日战争胜利已有半年之多，但社会经济状况却不尽人意。对此，宋子文分析了产生经济困难的原因，也提出了若干解决办法。

1946年3月9日，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，宋子文承认，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困难要比抗战时期更为严重。他认为，战后经济困难甚于战时，这是一种普遍现象，法国、英国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。谈到中国，他指出：“我国经过了八年的抗战，所受的损害比较任何国家为重。这好象一个久病的人，决

① 《申报》，1946年1月23日。

② 《大公报》，1946年3月23日。

不是一帖药可能医治，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恢复健康。”他认为，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，但主要是下列四项：

一、抗战中一切重要的物资长期消耗，生产则减少，导致全国物资短绌，供应不能平衡；

二、随着战争的结束，沦陷各地一一收复，复员之支出甚为浩大，收入之增添却尚未实现；

三、由于长期战争，敌人破坏及经济封锁的结果，交通工具逐渐减少，运输物资的效能也日形低落，几乎达到完全停顿状态；

四、经济生产能力，因原料缺乏，交通阻滞并受到敌人之破坏等种种关系，以致日趋薄弱。

宋子文还认为，中国“经济上的病源”不仅多而且复杂，“并且抗战虽然结束，大部分复杂的病源依然存在”。

在指出了导致经济困难的原因之后，宋子文又提出了解决困难的诸项办法。他的基本观点，是必须同时从多方面入手：“在治疗方面，很明显的必须从多方面进行，并且需要治本治标同时进行，方能克制。”<sup>①</sup>他进而提出了四项“应付经济危机的方略”：第一、谋收支的平衡；第二、增加物资的供给；第三、尽速恢复交通运输；第四、开放对外贸易。<sup>②</sup>这四项“应付方略”中属于财政和对外经济关系方面的主张，将在以后分别专门述及，这里仅对涉及社会生产和经济建设的观点作一分析。

在增加物资供给方面，宋子文提到了发展国内生产这一重要手段。但是，怎样才能发展生产呢？政府应做到哪些呢？他认为应设法“得到国外之机器及原料，以促进其生产的力量”；但是，

①② 《大公报》，1946年3月9日

③ 《大公报》，1946年3月10日。

“更重要的是政府应当尽力恢复社会秩序及水陆交通，平稳物价，安定生活，抑低利息，则企业复兴，物资之供应自能给足”。在恢复交通运输方面，宋子文谈到了修复被破坏了铁路、公路线路，从国外购入船舶卡车等运输工具，并开辟对南洋的海上运输业。总的来看，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的报告里，宋子文提出的解决经济困难的办法中，属于生产建设性的较少，而着重于流通特别是从国外购入大量所需的资料，包括生活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。通观报告全文，缺乏对长期经济目标和相应手段的论述。

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发起全面内战之后，国民党统治区经济状况逐步恶化，宋子文开始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，要求其拿出摆脱经济困境的办法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宋子文是怎样看待经济局势的，他的经济建设主张又是如何的呢？

这一时期宋子文在各种公开场合的谈话，几乎无不涉及经济问题。但较集中体现他的观点的，则是1946年10月向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提交的政治活动报告（财政金融经济部分）。

宋子文指出：“胜利以来，收复区内，疮痍未复，而后方各工矿业，则又感挫折，加以匪患滋蔓，交通梗阻，物资匮乏，生产停顿，物价升腾，工潮纷起，经济情形，实感危迫。故必须促进经济复员，及增加物资供应，以为救济目前及策兴未来之计。”

宋子文认为，扭转经济困难局面的措施固然是多方面的，“然其要点，首在恢复交通”。怎样恢复以及恢复的效果如何呢？他指出：“内地交通，原赖铁路公路，虽于胜利之后，拨发巨款，抢修公路，奈以受匪患影响，平汉、津浦、陇海、胶济等线，迄未能通，因之内地生产物资，迄未能供应，妨碍经济复员，至为重大。”显然，宋子文还是能较清醒地看到交通不尽人意的状况及其对经

济建设的不利影响。怎么办呢？“政府虽受如此严重阻难，惟对于恢复交通，随军事进行，从未一息稍懈”。<sup>①</sup>事实上，宋子文对真正恢复交通，已不抱什么希望了。

然而，宋子文的主张“积极”采取“经济复员之措施”，这方面措施的“注重之点，首在迅速复工，增加生产”。第一，“对于重工业及规模较大之重要民生工业，……均交由资源委员会，迅速整理复工”；第二，“战时政府在后方创建之事业，亦规定调整计划，先后施行。……其有与恢复区各厂矿合并经营之必要者，则尽量归并，或设专营公司，以利推行”第三；“对于商营各厂矿，为维护正当人民之益，尽量予以协助。如扩张工业之贷款，调解劳资纠纷，改进工业技术，促进出口贸易等，均由实际上为其解决困难，以达增加生产及发展国际商务之目的。”<sup>②</sup>

宋子文还强调：“经济复员，自以增加生产为第一义。”他认为，“各项物资中，其最要者，为煤”。因此，他特别重视国内各大煤矿的复工投产和增产。除了煤之外，他把纱布、盐和糖也列入重点物资，力求达到增产。<sup>③</sup>至于该采取哪些措施来增加生产，各种重要物资相应的增产指标，则没有只字提及。可见，在这份报告中，宋子文对发展社会经济建设也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见解。

此后，宋子文被政府财政困境和黄金、外汇政策的失当搞得焦头烂额，已无暇顾及生产建设问题。但是，他于1947年3月1日在立法院所作的辞职报告中，仍未忘说了以下一段话：“当我们一方面竭力节减费用的时候，我们还须同时不惜任何代价，发展生产，……我国地大物博，民俗勤劳，只要大家肯决心力行，目前的困难，是不难消除的。”<sup>④</sup>

<sup>③</sup> 《行政院向中央监察委员会提交的政治活动报告（财政金融经济部分）》，1946年10月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，档号二（2）1423。

《东方杂志》，第43卷，第6号，第82页，1947年3月30日。

从 20 年代中期至 40 年代后期，宋子文并未出长过国民政府中直接负责经济建设的部门，如广东、武汉时期的建设部，南京国民政府头 10 年的工商部、实业部，1938 年以后的经济部。但是，可以肯定地说，宋子文对所处时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建设现状及其前景，还是十分关心的。他在许多场合都谈论过发展社会经济建设的重要性，并从特定时期的局势出发，提出过发展经济建设的某些措施。相对而言，在国民党中央政权的决策层中，在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建设问题上，宋子文同中国工商实业界还是有着较多的共识，特别是在 20 年代末和 30 年代初期，虽然宋子文与他们的出发点并非完全一致。由于宋子文所处的地位，他在这方面的主张，或多或少地影响着社会经济建设的进程，并且基本上起着正面的促进作用。

从 20 年代中期到 30 年代初期，在发展中国经济建设问题上，宋子文还是提出了若干有见地的主张，尽管他未能提出周全的中长期经济建设计划和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。这段时期，也正是宋较集中精力于经济事务的年代。此后，宋子文政坛生涯颇多曲折，大起大落；到了抗战胜利后，中国社会只经历了短暂的和平阶段，又被国民党政权拖入内战的绝路，经济遭到空前的摧残。而宋子文也不可能摆脱种种束缚，超越政治的偏见，去继续探究发展社会经济建设的问题。他在这方面的观点和主张，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值得特别提及的内容了。

## 关于农业问题的论述

宋子文的经济思想中另一较重要的方面，是关于农业问题的论述。

在国民政府各时期，宋子文都没有主管过农业。但是，中国

是一个农业大国，以农为本的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，并对后世产生久远的影响。另一方面，农业作为一个主要的经济产业，又与社会经济的其他领域，如工业、商业、都市生活乃至社会金融、政府财政，都有着密切的联系。因此，宋子文在其政治生涯中，无论是主持商务、财政、金融，还是出长外交部，都对农业问题有所关注，在不少场合谈到了农业的重要性和发展中国农业的途径。

在广东时期，宋子文谈论农业问题的场合并不多。现在所能见到的资料中，较集中地反映宋子文的农业观点的，就是 1925 年 8 月的《广东商务厅筹议商务行政计划书》。在该计划书中，宋子文不仅谈到了以粮食为代表的基本农业，还提到了林业、渔业以及蚕桑、牧畜、养蜂等广东地区的农家副业。

宋子文认为，必须尽快解决广东粮食生产供不敷求的状况，提出了试行三熟制、改良种子、合理施肥、防治病虫害、进行农事试验等增产措施。当时他在粮食这一基本农产品方面的初步目标是：“务使本省尽其地力，农产加增，即一时不能免于仰给他方，亦冀其渐有可恃之进步。

在林业问题上，宋子文当时关注的并不是直接林产品的数量，而是从广东的具体情况出发，注重防止对林木的乱加砍伐，从而收到从根本上防治水灾发生的更大的效益。对于 20 年代中期广东各林区业已出现的滥加砍伐状况，宋子文颇为担忧。他谈到“粤山秀丽，为世所称，乃所产林木每供樵采，民间燃料取给，于是旦旦而伐，遂不免牛山濯濯，纵有美质，不及成材。”为了扭转这一状况，他认为一方面应该设法增加煤的采掘，对民用燃料有充足的供给，从而逐渐改变人们伐薪采樵这一传统的民间燃料取给方式。另一方面，他主张积极宣传植林对于防治水灾所具有的独